

当今民主

史蒂文·莱维茨基
卢坎·韦文

徐行健 译

史蒂文·莱维茨基 (Steven Levitsky) 是哈佛大学大卫·洛克菲勒拉丁美洲研究讲席教授兼政府学教授。卢坎·韦 (Lucan Way) 是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合著了《竞争性威权主义：冷战后的混合政体》(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2010 年)

译者徐行健系中国大陆专业人士

中国民主季刊

第 4 卷 第 3 期

2026 年 7 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新式竞争性 威权政体

编按：竞争性威权主义是这样一种政体，它具有实质性的民主制度，但同时存在当权者严重滥权；选举有竞争性，但并不公平。这种政体的产生与冷战后国际国内环境相关，目前仍然在不少国家顽强存在，并且发展到了一些有强大民主传统与制度的国家。史蒂文·莱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卢坎·韦（Lucan Way）曾最早提出了“竞争性威权主义”的概念，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这一新的发展趋势。本文2020年首先发表于美国《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31, Number 1, January 2020, pp. 51-65），它提到体现这一趋势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匈牙利。虽然欧尔班在2026年4月的选举中落败下台，但他曾如何扭曲、推翻民主制度仍然值得研究，以作为历史的镜鉴。

近20年前，我们在《民主季刊》发表了关于“竞争性威权主义的兴起”一文。¹ 文章介绍了一种政体类型：在这种政体中，具有实质性的民主制度与当权者的严重滥权并存；选举竞争是真实的，但并不公平。时至今日，竞争性威权主义仍然顽强存在。正如克里斯托弗·卡罗瑟斯（Christopher Carothers）所指出的，在冷战后时期，此类政体的国家相当不稳定。² 一些竞争性威权政体实现了民主化（包括秘鲁、斯洛伐克和台湾），而另一些则固化为完全的威权主义（如白俄罗斯、柬埔寨和俄罗斯）。还有一些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贝宁和乌克兰），则在民主和竞争性威权主义之间来回摇摆。³

我们在2010年出版的《竞争性威权主义：冷战后的混合政体》一书中所考察的35个竞争性威权政体，在1990年至2019年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其中15个实现了民主化；⁴ 6个曾实现民主化，但后来又倒退回（通常是竞争性的）威权主义；⁵ 4个滑向了全面威权主义；⁶

还有 10 个则一直是竞争性威权主义。⁷

尽管竞争性威权主义在一些国家瓦解，它又出现在另外一些国家。如几内亚、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干达等国，其政权从霸权统治放松到竞争性威权主义。而玻利维亚、匈牙利、菲律宾、土耳其和委内瑞拉等国家，则从民主制度退化为竞争性威权主义（委内瑞拉此后已沦为完全威权主义）。⁸ 总体而言，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竞争性威权主义国家的数量一直相对稳定。我们在 1990—1995 年期间统计到 35 个竞争性威权主义政权，而在 2019 年，这一数字为 32 个（见下表）。这个数字有些保守，因为我们排除了曾经属于竞争性威权主义而最近发生政权更迭的国家，实际上给了亚美尼亚、冈比亚、马来西亚和乌克兰等国家的新政府一个“疑罪从无”（benefit of the doubt）的机会。

表——竞争性威权主义国家，2019 年

撒哈拉以南非洲	
贝宁	莫桑比克
博茨瓦纳	尼日尔
布基纳法索	尼日利亚
科特迪瓦	塞内加尔
加蓬	塞拉利昂
几内亚	坦桑尼亚
几内亚比绍	多哥
肯尼亚	乌干达
马达加斯加	赞比亚
马拉维	津巴布韦
马里	

中东欧

匈牙利

塞尔维亚

黑山

北马其顿

前苏联国家

吉尔吉斯斯坦

亚洲 / 中东

孟加拉国

土耳其

菲律宾

拉丁美洲

玻利维亚

洪都拉斯

海地

西方自由主义主导地位的衰落

竞争性威权主义的持久存在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竞争性威权主义是冷战后才出现的现象——它是对全面独裁特别不利的国际环境的产物。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催生了大约 15 年的西方自由主义独领风骚时期，以美国无与伦比的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力量为标志。⁹ 在 1990 年代，美国和欧洲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西方大国几乎就等同于“国际社会”。这种优势地位，加上为促进民主所作的前所未有的国际努力，在世界上有力地推动了统治精英采纳西方式政治制度。除少数几个国家（通常是拥有核武器、石油或庞大国内市场的国家）外，维持完全独裁统治的代价变得极其高昂。在与西方联系最紧密、受西方影响最强（依赖西方）的地区，如中东欧和美洲，外部的民主化压力最为强烈。¹⁰

冷战后的国际环境曾有利于竞争性威权主义的兴起。随着多党制选举在全球扩展，国内条件相对有利的国家（包括墨西哥、波兰、南非和台湾），普遍实现了民主化。但多党制治理也扩散到了许多民主条件极为不利的国家：经济贫困、国家机器运转失灵、中产阶级规模小，且反对派和公民社会力量薄弱的国家（如贝宁、海地、马达加斯加和马里）；以及后共产主义国家，其政府规模过大，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规模过小（亚美尼亚、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或是具有上述所有特征的国家（阿尔巴尼亚、柬埔寨、北马其顿和罗马尼亚）。根据几乎所有现行的社会科学研究，这些国家“本应”是威权主义政体，但外部压力迫使其精英阶层允许一定程度的多元化和选举竞争。由此，在其他历史背景下极可能作为纯粹独裁统治的国家，在后冷战的时代却变成了混合政体。

这种局面并未持续太久。21世纪初，国际环境发生了剧变。首先，中国和俄罗斯的崛起改变了全球力量平衡，终结了西方自由主义的优势地位。俄罗斯积极挑战自由主义的国际准则，不仅在邻国格鲁吉亚和乌克兰，而且在叙利亚、委内瑞拉甚至西方民主国家都展现了其影响力。中国利用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推动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上海合作组织等替代性国际机构的建立。中国还启动了野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一规模达万亿美元的援助与投资项目，旨在“将各国在经济上与北京捆绑在一起”，并建立一个“对中国友好的政治共同体”。¹¹

与此同时，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力却在衰落。美国主导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欧盟日益加剧的内部困境，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都

侵蚀了西方国家的实力、威望和自信。这种危机由于西方内部反自由主义势力的上升而进一步加剧，这在美国尤为显著。在这种新的背景下，西方大国推动民主的意愿和能力均有所减弱。欧盟曾在 1970 年代对南欧、1990 年代对中东欧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在 21 世纪初却几乎未采取行动遏制重新抬头的威权主义。同样，美国总统对海外民主的支持，在巴拉克·奥巴马任期内逐渐减弱，并在唐纳德·特朗普执政期间实质上停止了。从洪都拉斯到匈牙利再到菲律宾，特朗普政府摒弃了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方针，转而接纳独裁者。

因此，到 21 世纪初，西方的联系与影响已丧失了大部分力量。随着军事、经济和外交支持的替代来源不断涌现，西方的影响力遭到削弱。来自中国、俄罗斯，以及某些情况下来自伊朗或委内瑞拉的援助，降低了威权政府对西方的依赖。中国和俄罗斯在 1990 年代曾充当地区的“黑骑士”（black knights，在民主转型研究中，指那些为面临西方压力的专制政权提供资金或外交支持的大国，帮助它们抵御外部的民主化压力——译者注），到 21 世纪初则成为了全球性的“黑骑士”。¹² 而与西方的联系效用则被稀释，因为西方对推广民主的兴趣降低。当其他国家的政客、技术官僚和商界领袖认为政府的不民主行为不会危及他们与西方的关系时，他们就更没有动力去反抗这种不民主。

在中美洲和中东欧地区，与西方的联系及其影响力已显而易见地减弱。在这些地区，1990 年代与西方建立的广泛连结极大地提高了威权主义的代价，使得即使是温和的竞争性威权主义也难以维系。事实上，1990 年至 1995 年间存在于中东欧和美洲的几乎所有竞争性威权

主义政权，到2004年都已实现民主化。然而到今天，威权主义在这两个地区均已卷土重来。在2019年存在的32个竞争性威权主义案例中，有6个是与西方有着紧密联系的美洲和中东欧国家。¹³ 另外两个与西方联系紧密的国家——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如今已成为完全的威权政体。

欧盟影响力的削弱在匈牙利表现得尤为明显。1990年以后，匈牙利曾一直是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在21世纪初，很少有观察家认为其民主制度面临风险。然而，从2010年开始，由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án）领导的“青民盟”（Fidesz）政府利用其在议会中的绝对多数席位，扭曲了政治竞争环境。欧尔班政府向宪法法院安插亲信，通过将国有媒体政治化，以及通过收编大部分私营媒体，限制反对派媒体的发声渠道，并操纵选区划分（gerrymander），以确保执政党对议会的控制。这与1990年代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欧洲施加的强大压力曾成功挫败了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萌芽中的威权主义企图，而2010至2018年间，分裂的欧盟对欧尔班政府几乎未采取任何惩罚性措施。

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案例凸显了美国在美洲地区推动民主的挫败。2009年，洪都拉斯军队推翻了民粹主义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Manuel Zelaya），导致民主进程脱轨。奥巴马政府谴责了那场政变，并暂停了非人道主义援助，但得到许多美国共和党人支持的洪都拉斯精英阶层却默许了政变，使得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收效甚微。尽管文职人员治理很快得以恢复，2010年也举行了公平的选举，但在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Juan Orlando Hernández）总统执政期间

（2014 年至今），政权逐渐滑向了竞争性威权主义。埃尔南德斯在 2012 年担任国民议会议长期间便已在最高法院安插亲信，他公然藐视宪法中关于总统不得连任的长期禁令，指使效忠于他的最高法院裁定该条款“不适用”。2018 年，埃尔南德斯在一场充满舞弊的选举中成功连任。尽管民众发起大规模抗议，美洲国家组织也呼吁重新计票，但特朗普政府始终保持沉默，这就为埃尔南德斯日益专制的政府提供了合法性。由于洪都拉斯与美国的关系被认为没有受到威胁，商界领袖、军方官员及其他有权势的精英阶层几乎未受到压力要与政府决裂（相反，1993 年危地马拉总统政变和 1994 年多米尼加共和国选举舞弊事件发生后，却曾出现过这种情况）。

西方的联系和施压也未能阻止尼加拉瓜向威权主义的倒退。2006 年，左翼桑地诺运动（Sandinista movement）的丹尼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重返总统职位后不久，尼加拉瓜脆弱的民主便开始瓦解。2008 年，支持政府的机构剥夺了一个反对党（桑地诺复兴运动）的合法地位，并强行用奥尔特加的一名忠实追随者取代了另一个政党（尼加拉瓜自由联盟）的领导人。同年举行的市长选举因违规行为而遭到破坏。2009 年，由亲政府人士占据多数的最高法院推翻了尼加拉瓜宪法对连任的禁令；两年后，奥尔特加在一场存在缺陷的选举中连任，据可信的观察员称，选举结果“无法证实”。¹⁴ 2011 年后，这个国家向威权主义的转变加速。2014 年的宪法修改允许总统无限次连任。2016 年，主要的反对派力量被剥夺了在立法机构的席位。2018 年，一波反对派抗议活动遭到残酷镇压，造成数百人死亡。如今，政权已演变为全面的独裁统治。

尽管现在的奥尔特加政府比 1980 年代末桑地诺主义政权的统治更加专制，但其面临的外部民主化压力却小得多。除其他因素外，委内瑞拉以补贴石油和约 45 亿美元援助形式提供的“黑骑士”式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压力。此外，奥尔特加政府在贸易、毒品和边境安全等问题上与华盛顿的合作，冲淡了支持美国采取惩罚性行动的力度。¹⁵ 事实上，2017 年全年，尼加拉瓜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及美国对尼加拉瓜的援助均保持稳定。

在洪都拉斯、匈牙利和尼加拉瓜等与西方联系紧密的国家中，威权主义的持续存在表明，与 1990 年代相比，西方的民主化压力已大为减弱。即使是在与西方关系密切的小国，专制行为也不再会引发代价高昂的国际社会惩罚性反应。换言之，威权主义的外部成本已经降低了。

为什么竞争性政治依然存在

显然，当今世界对威权主义的拒斥，已不如冷战后初期那般强烈。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种变化会促使许多政权抛弃其竞争性因素，彻底转向威权主义。既然压制带来的外部成本对独裁者而言已可承受，他们又何必容忍允许公开反对派和多党选举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确实有少数政权遵循了这一逻辑。例如在柬埔寨，1990 年代，巨大的国际压力迫使洪森政府将反对派合法化，并允许举行竞争性的多党选举。然而在过去十年间，随着西方压力的减弱以及中国提供的支持，洪森得以取缔主要反对党，将主要反对派领导人监禁或流放，从而重新巩固了全面的专制统治。

但这类案例并不多见。在我们于1990至1995年间确认的35个竞争性威权主义政权中，截至2019年，仅有五个——白俄罗斯、柬埔寨、喀麦隆、尼加拉瓜和俄罗斯——可被归类为霸权型或封闭型专制政权。其余的仍保持着竞争性特征：其中15个已转型为民主政体，另外15个仍维持着竞争性威权体制。

因此，在“后冷战后”（post post-Cold War）时代，竞争性政体依然出人意料地坚挺。即使是那些民主条件极为不利的国家——贝宁、冈比亚、海地、吉尔吉斯斯坦、利比里亚、马拉维、马里、蒙古、塞拉利昂——也依然保持着竞争性威权主义，甚至民主体制。鉴于国际环境日益不利，为何全面威权主义未能卷土重来？

竞争性选举制度的韧性既有国际根源，也有国内根源。在国际层面，自由主义的西方或许处于低谷，但绝非出局。西方民主国家依然是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国家。2017年，美国的军事开支是中国的三倍，且超过了排在其后的7个最大军事强国的总和。¹⁶ 全球10大经济体中，有9个是成熟的民主国家，美元依然是世界货币。¹⁷

同时，对自由民主的挑战依然微弱、收效甚微。冷战时期，中国和苏联曾大力在欧洲、亚洲及其他地区传播共产主义。相比之下，当今的中国和俄罗斯相对较少地在海外推广替代性政体模式。这两个国家主要致力于支持地缘政治盟友并削弱对手，而非单纯推广威权主义。在中国，尽管习近平对批评其政权的外国人士和机构——包括企业和大学——进行了强硬反击，但尚不明确其政府是否意图在海外推广专制主义。¹⁸ 同样，俄罗斯对威权主义的支持大多是机会主义的——且往

往收效甚微。在专制的吉尔吉斯斯坦和摩尔多瓦，普京政府曾支持（亲俄的）反对派势力。而在某些情况下，包括乌克兰在内，俄罗斯的干预手段如此笨拙，以致引发了反俄派反弹，反而增强了民主力量。

此外，与历史上的其他时期不同，21 世纪初尚未出现任何能够挑战自由民主的合法替代模式。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曾获得精英阶层和广大民众的广泛支持。组织严密的政党和运动将这些意识形态奉为优于自由民主的替代方案。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列宁主义的一党专政受到一批颇有威望的第三世界领导人拥护，包括阿尔及利亚的艾哈迈德·本·贝拉（Ahmed Ben Bella）、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越南的胡志明（Ho Chi Minh）、加纳的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以及坦桑尼亚的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等等。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南美洲和亚洲部分地区，右翼军事独裁政权被广泛视为一种虽非理想但合法的手段，用于抵御共产主义。

而当今世界并不存在此类替代模式。相反，多党制选举仍被广泛视为执政的最合法途径。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公众舆论基本上仍与丘吉尔关于民主的名言一致：公民未必热爱民主，但除少数几个国家（包括中国和新加坡）外，他们没有发现其他更好的选择。¹⁹ 社会可能并不完全信奉自由民主的原则，但人们喜欢竞争性选举，特别是他们看重能够投票罢免坏政府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地的公民——最近在阿尔及利亚、亚美尼亚、玻利维亚、布基纳法索、香港、尼加拉瓜、俄罗斯、苏丹和委内瑞拉——继续走上街头，要求或捍卫竞争性选举。

因此，尽管西方自由主义面临各种挑战，但多党选举制度依然异常稳固。²⁰ 民粹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t）运动在许多国家威胁着自由权利，但这些挑战依然植根于选举政治。民粹主义削弱了自由制度，往往将民主国家推向竞争性威权主义，²¹ 但它极少彻底废除选举竞争。即便当代的军事政变，也很少导致独裁统治。正如尼古拉·马里诺夫（Nikolay Marinov）和海因·戈曼斯（Hein Goemans）所指出的，冷战后的大多数政变，之后都举行了竞争性选举。²² 在很大程度上，选举依然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竞争性政治之所以在世界许多地区持续存在，还有重要的国内原因。许多当代的独裁者，缺乏消除反对派、维持内部凝聚的制度能力，而维持内部凝聚是巩固霸权统治所需要的。²³ 首先，他们缺乏最低限度的有效国家机器。国家能力的薄弱——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前苏联、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非常普遍——损害了经济表现，限制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还滋生了普遍的腐败。因此，掌握弱势国家体制的政府往往面临广泛的公众不满，这很容易导致反对和抗议。正像民主国家在国家能力薄弱时，容易出现严重的治理和可治理性（governability）问题一样，专制国家也是如此。

更关键的是，弱势国家的独裁者往往缺乏压制反对派挑战的强权能力。如果军队、警察和其他安全部门装备落后、资金不足且纪律涣散，那么即便是规模不大的抗议，也无法指望它们去平息。国家官僚机构和强力部门的极度软弱，使独裁者面对“人民力量”起义时变得脆弱。例如在吉尔吉斯斯坦，2010年，仅数千名轻装示威者便压倒了警察，占领了首都的政府大楼，独裁者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

(Kurmanbek Bakiyev) 随后下台。正如斯科特·拉德尼茨 (Scott Radnitz) 所指出的：“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机器依然如此软弱，以至于一名抗议者只需驾驶卡车冲破‘白宫’正门，便为暴民涌入大楼打开了通道。”²⁴ 同样，在马达加斯加，2002年迪迪埃·拉齐拉卡 (Didier Ratsiraka) 在选举舞弊后因军队袖手旁观、拒绝镇压抗议者而下台。7年后，他的继任者马克·拉瓦卢马纳纳 (Marc Ravalomanana) 也以类似方式下台——军队在反政府骚乱中哗变，他随后放弃权力。

软弱的执政党也会阻碍在任统治者巩固权力，使其容易受到内部分裂和权力交接危机的冲击。例如，乌克兰总统彼得罗·波罗申科 (Petro Poroshenko) 于2014年上台时，他的政党“不过是个传说” (no more than a myth)，甚至连网站、公开的地址或电话号码都没有。²⁵ 这限制了波罗申科维持权力的能力，更不用说巩固权力了。2018年底，在遭遇俄罗斯海军袭击后，波罗申科宣布实施戒严，推迟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然而，部分由于其盟友的反对，他被迫修改了戒严令，确保选举按原定计划进行。随后，他惨败于政治素人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在托马斯·博尼·亚伊 (Thomas Boni Yayi) 执政的贝宁 (2006–16)、拉斐尔·科雷亚 (Rafael Correa) 执政的厄瓜多尔 (2007–17)、埃杜阿尔德·谢瓦尔德纳泽 (Eduard Shevardnadze) 执政的格鲁吉亚 (1992–2003)，以及阿卜杜拉耶·瓦德 (Abdoulaye Wade) 执政的塞内加尔 (2000–12) 等案例中，处在早期阶段的竞争性威权主义同样因执政党力量薄弱而受到削弱。

国家和政党的弱势，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竞争性威权主义——而非完全的独裁统治——得以持续存在。事实上，全球三分之二的竞争性威权主义政权（32 个中的 21 个）位于非洲——这个地区具有全球最脆弱的国家体系。在贝宁、几内亚比绍、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和塞拉利昂等国家，低效的官僚机构、资金不足的安全部队以及软弱或不存在的执政党，都限制了政府巩固威权统治的努力。

因此，在许多国家，竞争性政治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其根源在于一种默认的多元主义（pluralism by default）：专制统治者根本缺乏巩固霸权所需的组织资源和强制能力。弱势国家和政党会动摇各类政体的稳定性。在这种条件下诞生的民主政体（如贝宁、海地和马里）往往脆弱，但新的专制政体同样如此。换言之，在“后冷战后”（post-post-Cold War）时代，国家虚弱阻碍了威权统治的巩固。

竞争性威权主义的新面貌

我们曾指出，大多数的竞争性威权主义政权，出现在对民主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低收入国家，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民主传统，制度、法治薄弱，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发育不全，反对派力量弱小。在这样的环境中，要扭曲竞争环境相对容易。薄弱的国家机构更容易被安插亲信（packed）和被操纵；资金匮乏的媒体、企业和反对党也更容易被收编。一旦发生滥权行为，反对派的抗议往往规模有限、零星分散。因此，即便是能力平平、不得民心的领导人，也常常能够推翻民主制度（即使他们无法巩固独裁统治）。在这种情况下，竞争性威权主义

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产物，因为领导人无需动员大众支持，也无需建构庞大的选举多数盘。

然而，在少数几个与此截然不同的国家，近年来也出现了“竞争性威权主义”。在匈牙利、菲律宾、土耳其和委内瑞拉，其民主的传统和制度比上述国家更强大。它们拥有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或多或少地建立了法治。其经济更为发达，拥有蓬勃发展的私营部门、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以及强大的反对党。此外，这些国家与西方有着广泛的联系，这意味着其政府面对的外部监督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前苏联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更为严格。因此，在这些新案例中，要扭曲竞争环境会困难得多。当权者要面对独立的法官、有声望的独立媒体，以及拥有资源、能够在街头和投票站有效动员支持者的反对派。

要在匈牙利、菲律宾、土耳其和委内瑞拉这些国家扭曲政治竞争，相比贝宁、马达加斯加或摩尔多瓦来说，需要更大的技巧、更复杂的策略以及广泛得多的民众动员。潜在的独裁者必须先掌握相当规模的多数选民，然后诉诸全民公决（plebiscitarian）或利用超多数席位（hypermajoritarian）策略，来改变宪法和选举规则，从而削弱对手并锁定自己对权力的掌控。

这通常是通过采取激化对立的民粹主义或族裔民族主义策略来实现的。例如，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和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在严重经济危机中进行竞选，他们利用有效的民粹主义诉求，调动了民众长期以来对既有政治精英的愤怒情绪。在匈牙利，“青民盟”通过在

一场重大腐败丑闻后巧妙地煽动反精英情绪，于2010年取得了压倒性的选举胜利，从而执掌了政权。在菲律宾，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敏锐地利用了民众对犯罪率飙升和长期腐败的普遍不满情绪。最后，在印度——这个可能正处于竞争性威权主义边缘的成熟民主国家——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和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利用宗教民族主义，动员了占多数的印度教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在上述每一种情况下，娴熟的民粹主义或族裔民族主义诉求，都为潜在的独裁者提供了广泛的公众支持和议会多数席位，这些正是他们为了扭曲竞争环境而寻求宪法及其他方面的改变所需要的。此外，鉴于国内外监督力度相对较强，这些举措不得不比其他竞争性威权政权所采用的方式更为隐晦和精巧。

匈牙利的威权主义之路

这种新型“竞争性威权主义”模式的最典型案例当属匈牙利。就在2010年，匈牙利还被普遍视为一个制度健全、政党体系竞争充分、公民社会充满活力、媒体自由和多元的巩固民主国家。1990年至2010年间，匈牙利历经五次政权更迭，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通过选举轮流执政，那些选举“关乎政府的政治色彩，而非政权的性质”。²⁶ 2004年，匈牙利加入欧盟，因此带来了数十亿欧元的农业补贴，至今仍得到大多数匈牙利人的支持。²⁷

欧尔班和“青民盟”最初于1998年以自由主义中右路线上台执政。但从21世纪初开始，特别是在该党2002年选举失败后，欧尔班转变了路线，抛弃自由主义，转而拥抱宗教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并开

始耍手段激化匈牙利的政治对立。与其他地方的民粹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政党一样，欧尔班的反精英呼吁调动了沉寂已久的愤怒，特别是在农村选民中。他越来越转向非自由主义，纵容“蓄意破除禁忌”（calculated breaking of taboos）——即冲破那些约束反犹太、反罗姆人（anti-Roma）言论的社会禁忌——借此吸引极右翼支持。²⁸

2010年，“青民盟”凭借议会绝对多数席位重掌政权后，便开始推翻民主体制，其手段极具破坏力，但又足够隐蔽以减少欧盟的反弹。关键在于，欧尔班政府并未以表面上公开侵犯基本公民自由的手段，比如逮捕反对者或查封独立媒体，就实际巩固了权力。2011年，“青民盟”声称法院和其他国家监督机构已被共产主义者控制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所掌控，遂利用其在议会的多数席位通过了一部“基本法”，取消了对总理权力的关键制衡。最值得注意的是，宪法法院的规模被扩大，并安插了“青民盟”的忠实支持者，此后该法院便失去了政治上的重要性。政府还把忠于自己的党羽安插进“国家选举委员会”。结果，此后通过官方渠道提交的几乎所有与选举相关的投诉，均以形式上的理由被驳回。到2012年，“青民盟”的忠实支持者已“盘踞在国家的每个角落——从宪法法院、预算委员会和国家司法办公室，到国家审计署、检察院和国家银行。”²⁹

欧尔班政府还有效控制了大部分新闻媒体——并非通过关闭报社或逮捕记者，而是通过幕后运作，将国有媒体政治化，将国际媒体集团赶出匈牙利市场，并协助与其结盟的商人控制私营媒体。例如，2014年，一家亲政府的媒体公司从两家与政府有联系的银行借款，用于收购 Origo.hu——这家领先的新闻网站此前一直对政府持强烈批评态

度。截至 2018 年底，“青民盟”的盟友控制着 500 多家媒体机构，这使得政府批评者越来越难以触及广大受众。³⁰

“青民盟”政府还通过有选择地投放政府广告，以及利用国家影响力来左右其他广告商，从而塑造了媒体环境。例如，2010 年后，许多公司因担心政治后果，停止在反对派的广播电台“Klubradio”投放广告。由于广告收入枯竭，许多独立新闻机构被迫关闭。³¹ 由于缺乏明显的胁迫手段，政府得以将这些关闭事件描绘成影响所有媒体的市场力量所致，而非专门针对反对派媒体的专制压力。

最终，“青民盟”通过一系列选举改革锁定了自己的优势。这些改革包括：恶劣、不公正的党派选区划分；取消议会第二轮决选，这减少了实力较弱的反对党胜选的机会；以及禁止在私营媒体上投放竞选广告，这实际上将电视竞选宣传限制在（有偏向的）国营媒体上。³² 这些优势使“青民盟”在 2014 年无需在投票日诉诸赤裸裸的舞弊手段，就保住了议会中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席位，尽管其得票率已从上届选举的 53% 下降到了 45%。

尽管匈牙利政府明显滑向了“竞争性威权主义”，但欧尔班政府通过巧妙利用“青民盟”在欧洲人民党（EPP）——这个主导欧洲议会的保守派阵营——中的成员身份来转移批评，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欧盟的谴责。直到 2019 年 3 月其政党被欧洲人民党暂停成员身份之前，欧尔班一直受到欧洲人民党成员（包括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庇护，因为青民盟“提供了有助于欧洲人民党维持其在欧盟政治中主导地位的选票”。³³ 因此，这种隐蔽的滥权手段与欧洲议会内部战

略联盟结合，使欧尔班政府在近 10 年的时间里得以避免欧盟的惩罚性行动。2019 年，欧洲地区各方对布达佩斯的压力有所增加，但鉴于匈牙利扭曲的政治环境，以及弱小且分裂的反对派，欧尔班对权力的掌控似乎依然稳固。

向西方扩散？

其他欧洲领导人也试图效仿欧尔班的策略。最接近的例子就在邻国波兰。自其领导的保守派“法律与公正党”（PiS）于 2015 年执政以来，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便试图（用他自己的话说）打造一个“华沙的布达佩斯”。³⁴ 与“青民盟”一样，“法律与公正党”也试图对法院进行清洗和安插亲信、破坏选举委员会的独立性、夺取公共广播机构的控制权，并清除军队和情报部门中被认为对该党不够忠诚的人员。这些举措并非总是得逞。由于公民的强烈反对、“法律与公正党”未能在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加上欧盟的更严厉反制，波兰的民主在 2019 年得以存续。然而，滑向“竞争性威权主义”的威胁依然非常现实，尤其是考虑到“法律与公正党”在 2019 年 10 月轻松连任的事实。

比匈牙利和波兰的民主制度遭到攻击更令人惊讶的是，有证据表明，这些策略可能正在向成熟的西方民主国家扩散。在围绕国家认同问题的两极对立日益加深的背景下，西方的非自由主义或民粹主义右翼势力，已与欧尔班以及俄罗斯建立了密切联系，并采纳了他们的一些威权主义做法。例如，在 2017 年奥地利大选前，奥地利自由党的领导人被拍摄到寻求俄罗斯援助，并表示有意效仿欧尔班操纵媒体格局

的做法。在视频中，自由党领袖（未来的副总理）海因茨 - 克里斯蒂安·施特拉赫（Heinz-Christian Strache）宣称：“我们要像欧尔班那样构建媒体格局”，并支持俄罗斯接管奥地利主要小报《克朗报》（Krone）的构想。³⁵ 2017 至 2019 年间，作为奥地利政府的少数派执政伙伴，自由党致力于将国家电视台政治化，并利用内政部封杀批评性媒体，同时奖励亲政府媒体。意大利广受欢迎的极右翼领导人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同样将欧尔班视为政治榜样。萨尔维尼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强硬的本土主义（nativist）和反少数族裔言论，以及利用诽谤诉讼压制批评者的做法，引发了人们的担忧：未来由他领导的政府可能会走向非自由主义甚至专制主义方向。

类似的趋势甚至已经蔓延到了美国，特朗普政府借用了匈牙利和土耳其独裁者的“深层政府”叙事，他们以此为清洗行动以及在法院和其他关键国家机构中安插亲信提供正当理由。尽管特朗普在清洗执法、情报及其他公共机构方面的努力仅取得有限成效，但共和党已采取一系列其他措施，试图将选举格局向自身有利的方向倾斜，包括通过 10 余项州级的“选民身份验证”（voter ID）法律，这些法律使得低收入和少数族裔公民更难进行选民登记和投票。³⁶

人们曾普遍认为，在成熟的西方民主国家，系统性地扭曲政治竞争环境以打压政治对手的做法早已成为历史。而公开的非自由主义、甚至独裁的领导人可能上台执政，或者执政党会试图复制欧尔班式的威权媒体策略，这些在仅仅十年前还是几乎无法想象的。西方国家拥有强大的民主“抗体”（antibodies），包括健全的政治和法律制度、高度发达的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以及组织良好的反对派。在成熟的西方

民主国家，反对派所拥有的雄厚资金和组织资源，使得在这些国家扭曲竞争环境的难度，要远高于肯尼亚、土耳其、乌克兰或委内瑞拉等国。尽管如此，更隐蔽、更复杂的威权主义策略的出现，以及能够为这些行径争取多数支持的、有效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叙事的发展，仍是令人担忧的主要原因。竞争性威权主义不仅蓬勃发展，而且正在一步步向西方逼近。没有任何民主制度是可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

（作者感谢曼努埃尔·梅伦德斯（Manuel Meléndez）提供的出色研究协助）

注释

- 1 史蒂文·莱维茨基和卢坎·A·韦，《没有民主的选举：竞争性威权主义的兴起》，另参见莱维茨基和韦：《竞争性威权主义：冷战后混合政体》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 “Elections Without Democracy: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 (April 2002): 52–65. See also Levitsky and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from which many of the points below are drawn.]
- 2 克里斯托弗·卡罗瑟斯：《竞争性威权主义的出人意料的不稳定》 [Christopher Carothers, “The Surprising Instability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29 (October 2018): 129–35.]
- 3 丹·斯莱特，《民主的摇摆》 [Dan Slater, “Democratic Careening,” *World Politics* 65 (October 2013): 729–63.]
- 4 截至2019年12月，我们将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克罗地亚、多米尼加共和国、格鲁吉亚、加纳、圭亚那、马来西亚、墨西哥、摩尔多瓦、秘鲁、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台湾和乌克兰归类为民主国家。
- 5 这些国家是贝宁、北马其顿、马里、尼加拉瓜、塞内加尔和塞尔维亚。
- 6 这些国家是白俄罗斯、柬埔寨、喀麦隆和俄罗斯。
- 7 这些国家是博茨瓦纳、加蓬、海地、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莫桑比克、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 8 截至本文撰写之时（2019年11月），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已因2019年总统选举涉嫌舞弊引发的广泛抗议而下台。鉴于事态尚

在发展，我们维持对玻利维亚“竞争性威权主义国家”的归类。

- 9 亚历山大·库利和丹尼尔·内克森：《霸权的终结：美国全球秩序的瓦解》[Alexander Cooley and Daniel Nexon, *Exit from Hegemony: The Unraveling of the American Global Order* (forthcoming fr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0 莱维茨基和韦：《竞争性威权主义》[Levitsky and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 11 库利和内克森：《霸权的终结》。关于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另见拉里·戴蒙德所著《妖风：从俄罗斯的愤怒、中国的野心和美国的自满中拯救民主》[Cooley and Nexon, *Exit from Hegemony*. On the effects of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see also Larry Diamond, *Ill Winds: Saving Democracy from Russian Rage, Chinese Ambition, and American Complacency*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9).]
- 12 莱维茨基和韦：《竞争性威权主义》[Levitsky and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41; Larry Diamond, Marc Plattner, and Christopher Walker, eds. *Authoritarianism Goes Global: The Challenge to Democr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6).]
- 13 这些国家是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北马其顿、黑山和塞尔维亚。另外两个新出现的竞争性威权主义案例——菲律宾和土耳其——也具有与西方联系紧密的特点。
- 14 凯·M·塔勒：《尼加拉瓜：重返强人政治》[Kai M. Thaler, “Nicaragua: A Return to Caudillismo,” *Journal of Democracy* 28 (April 2017):159.]
- 15 塔勒：《尼加拉瓜：重返强人政治》[Thaler, “Nicaragua: A Return to Caudillismo,” 165, 163.]
- 16 库利和内克森：《霸权的终结》[Cooley and Nexon, *Exit from Hegemony*, chapter 1.]
- 17 参见 www.focus-economics.com/blog/the-largest-economies-in-the-world.
- 18 事实上，政治学家杰西卡·陈·韦斯最近断言：“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共产党正在蓄意推广专制主义或攻击民主。”[参见杰西卡·陈·韦斯：《美中关系中的意识形态竞争？中国捍卫专制评估》Jessica Chen Weiss, “An Ideological Contest in U.S.-China Relations? Assessing China’s Defense of Autocracy,” forthcoming in *Security and US-China Relations: Differences, Dangers, and Dilemmas*, eds. Avery Goldstein and Jacques deLisle. See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427181.]
- 19 参见理查德·维克·劳拉·西尔弗和亚历山德拉·卡斯蒂略：《全球许多人对民主的运作方式感到不满》以及理查德·维科等：《全球范围内对代议制民主和直接民主的广泛支持》[See Richard Wike, Laura Silver, and

Alexandra Castillo, “Many Across the Globe Are Dissatisfied With How Democracy Is Working,” *Pew Research Center*, 29 April 2019, 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19/04/29/many-across-the-globe-are-dissatisfied-with-how-democracy-is-working, and Richard Wike et al., “Globally, Broad Support for Representative and Direct Democracy,” *Pew Research Center*, 16 October 2017, 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17/10/16/globally-broad-support-for-representative-and-direct-democracy.]

- 20 在过去十年中, V-Dem (民主多样性数据库) 在“选举竞争”维度上的评分有所提升的国家数量, 超过了评分有所下降的国家数量。事实上, V-Dem在2019年得出结论称, 当今世界“比上个世纪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民主”。参见安娜·吕尔曼 (Anna Lührmann) 等: 《2018年世界状况: 民主面临全球挑战》See Anna Lührmann et al., “State of the World 2018: Democracy Facing Global Challenges,” *Democratization* 26, no. 6 (2019): 895–915.]
- 21 史蒂文·莱维茨基和詹姆斯·洛克森: 《安第斯地区的民粹主义和竞争性威权主义》[Steven Levitsky and James Loxton, “Populism and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Andes,” *Democratization* 20, no. 1 (2013): 107–36.]
- 22 尼古拉·马里诺夫和海因·戈曼斯: 《政变与民主》[Nikolay Marinov and Hein Goemans, “Coups and Democrac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4 (October 2014): 799–825.]
- 23 卢坎·韦: 《默认的多元主义: 弱势独裁者与竞争性政治的兴起》[Lucan Way, *Pluralism by Default: Weak Autocrats and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Politic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 24 斯科特·拉德尼茨: 《富人的武器: 中亚的掠夺性政权与精英主导的抗议》[Scott Radnitz, *Weapons of the Wealthy: Predatory Regimes and Elite-Led Protests in Central A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207.]
- 25 谢尔希·列先科, 《波罗申科与权力真空》[Serhii Leshchenko, “Poroshenko i porozhnecha” (*Poroshenko and the vacuum*), *Ukrainska Pravda*, 16 May 2014, www.pravda.com.ua/articles/2014/05/16/7025568.]
- 26 雅克·鲁普尼克: 《匈牙利的非自由主义转向: 事态是如何走向错误的》[Jacques Rupnik, “Hungary’s Illiberal Turn: How Things Went Wrong,” *Journal of Democracy* 23 (July 2012): 132.]
- 27 亚历山德拉·贝尼, 《欧洲晴雨表: 对欧盟的支持率创历史新高, 60%的匈牙利人支持欧盟成员国身份》[Alexandra Béni, “Eurobarometer : Support for EU at Record High, 60% of Hungarians Back Membership,” *Daily News Hungary*, 17 October 2018, <https://dailynewshungary.com/eurobarometer-support-for-eu-at-record-high-60-of-hungarians-back-membership>.]
- 28 保罗·伦德瓦伊: 《欧尔班: 欧洲的新强人》[Paul Lendvai, *Orbán: Europe’s New Strongm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48.]

- 29 米克洛什·班库蒂、加博尔·哈尔迈、金·莱恩·谢佩勒：《匈牙利的非自由主义转向：宪法失效》[Miklós Bánkuti, Gábor Halmai, Kim Lane Scheppele, “Hungary’s Illiberal Turn: Disabling the Constitu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23 (July 2012): 145.]
- 30 帕特里克·金斯利和本杰明·诺瓦克：《展示新闻自由如何消亡的网站》[Patrick Kingsley and Benjamin Novak, “The Website That Shows How a Free Press Can Die,” *New York Times*, 24 November 2018.]
- 31 《匈牙利独立媒体正与经济压力和恐吓作斗争》[“Hungary’s Independent Media Struggle Against Economic Pressure, Intimidation,”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7 July 2014, <https://cpj.org/blog/2014/07/hungarys-independent-media-struggle-against-econom.php#more>.]
- 32 参见 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hungarys_elections_free_but_not_fair; also Bánkuti, Halmai, and Scheppele, 145.
- 33 R·丹尼尔·凯莱门和洛朗·佩奇：《驱逐独裁者：欧洲人民党必须抛弃欧尔班，以挽救其残存的信誉》[R. Daniel Kelemen and Laurent Pech, “Ejecting the Autocrat: The EPP Must Ditch Orbán to Salvage What Remains of Its Credibility,” *Euronews*, 8 March 2019, www.euronews.com/2019/03/08/ejecting-the-autocrat-the-epp-must-ditch-orban-to-salvage-what-remains-of-its-credibility.]
- 34 《波兰新政府以欧尔班的匈牙利为榜样》[“Poland’s New Government Finds a Model in Orbán’s Hungary,” *Financial Times*, 16 January 2016, www.ft.com/content/0a3c7d44-b48e-11e5-8358-9a82b43f6b2f.]
- 35 《奥地利领导人呼吁提前举行大选，此前极右翼副总理辞职》[“Austrian Leader Calls for Snap Elections After Far-Right Vice-Chancellor Resigns,” *New York Times*, 18 May 2019, www.nytimes.com/2019/05/18/world/europe/aus-tria-strache-resigns-video.html.]
- 36 本杰明·海顿：《美国的选民身份验证法与投票率》[Benjamin Highton, “Voter Identification Laws and Turnou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 (2017): 151–53.]